

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

>>>

长三角产业转型 与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基于世界主要都市圈和部分国家的经验

周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长三角产业转型 与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基于世界主要都市圈和部分国家的经验

周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战略研究:基于世界主要都市圈和部分国家的经验/周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

ISBN 978-7-301-16471-6

I. 长… II. 周… III. ①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研究 ②长江三角洲-人才-资源开发-研究 IV. 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275 号

书 名: 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基于世界主要都市圈和部分国家的经验

著作责任者: 周 洁 著

责任编辑: 刘秀芹 朱 彦 王业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471-6/F·23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la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16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论	(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观点	(26)
文字说明	(31)
第一章 分析模型	(37)
第一节 背景资料:时间与空间维度中的长三角一体化	(37)
第二节 长三角经济发展中“明线与暗线”的分析模型 ——打造“政府——产业(明线)——人才 (暗线)”三元格局	(54)
第二章 现状解析之一:“产业转型——政府”	(68)
第一节 长三角产业布局的现状 & 解析	(68)
第二节 长三角产业转型的趋势与政府选择 ——兼论人才开发的迫切性	(81)
第三章 现状解析之二:“政府——人才开发”	(94)
第一节 人才政策——高层次人才	(94)
第二节 人才政策——高校毕业生	(111)
第三节 人才政策——高技能人才	(125)
第四章 他山之石	(139)
第一节 世界主要都市圈的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	(139)
第二节 部分国家的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	(152)

第三节 国外经验的归纳与启示
——兼论长三角“产业转型——人才开发”
的问题与原因 (164)

第五章 共赢战略 (184)

第一节 战略视角：“产业转型——人才开发”
跨区域综合合作的可行性
——基于“制度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的
重要要素”等理论 (184)

第二节 制度保障：构建“产业转型——人才开发
综合合作体系”的政治框架
——基于“跨行政区域立法”的新模式 (194)

第三节 战略分解：政府、高校、跨区域行会的职责 (206)

结语 开创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的新局面 (216)

主要参考文献 (218)

附：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人才流动与开发状况
调查问卷（企业卷） (225)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人才流动与开发状况
调查问卷（人才卷） (229)

后记 (233)

导 论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设长三角经济圈”的口号,上海经济区和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8 年解散)随之成立,进行浦东开发和综合配套改革,不断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快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地区的优化开发。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强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长三角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搭建并完善合作平台。特别是 2001 年以来的“沪苏浙三省市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等高层领导的会晤,分别讨论环境、旅游、信息等专题,更增进了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长三角各对应部门也分条线开展了交通网络、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协作行动。

然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問題。产业布局方面,产业同构严重,产业层次不高,产业安全得不到保障。对此,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知名经济学者郎咸平等入强调产业转型,即上海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江浙在现代制造业发展中增加服务的元素。但是,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又忽略了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出现了技术与人才等方面的“瓶颈”。如在人才开发方面,存在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人才流动

比较盲目、人才激励不够有效等问题。

这些看似独立的问题,其实有着共同的原因:一方面,各地政府在中央“放权让利”思想的指导下,都想使本地成为经济投资主体和经济收益主体,对资本、市场、自然资源、企业构成等状况给予了过多关注,形成恶性竞争。产业布局时对人才开发不够重视,导致人才资源的开发相对滞后,跟不上产业转型的步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合作应当是综合合作,有规划、有制度地稳步进行,而长三角的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在操作中分地区、分条线地独立开展,没有形成合力,高校、跨区域行会又很少发挥桥梁作用或综合协调作用。

长三角产业布局(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存在问题的共同原因,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作综合研究:建立“产业布局——政府——人才开发”的三元分析模型,分别解析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和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等人关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等任务应当由上海和上海周边地区共同承担”的论述,对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及其实施战略进行综合研究。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状况的解析,以及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对策的综合思考,主要达到如下三个目的:

一是研究区域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的内在联系。区域产业转型,离不开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区域人才开发及其合作,又应当结合产业转型,从战略的角度进行规划。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理论、国内外无数的区域发展经验、综合博弈模型也都表明:应将人才开发与产业转型进行有机的整合。

二是研究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问题的原因。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存在三组急需协调的关系: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市场或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是研究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问题的对策。长三角的产业发展战略是:“舍与得”相结合,各自舍弃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落后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并联手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鼓励各产业资源在

区域内外重新合理布局;同时,协作发挥沿海优势。长三角的人才发展战略是:借鉴纽约、新加坡等地“人才为产业调整之先导”的做法,切实发挥政府相关部门、高校、企业和跨区域行会的能动性,开发知识经济时代的有用人才,形成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长三角产业转型与人才开发的发展战略”,则是架构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合作体系,建立跨区域的立法模式,通过政府相关部门、高校、企业和跨区域行会等组织的共同努力,推动人才开发与产业转型的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该研究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创新长三角区域乃至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并提高产业安全,缓解产业发展失衡现象,扭转高科技一直由国外掌控、销售市场被外企垄断的局面;二是合力培养与使用人才,减少因结构失衡而导致高学历人才做学历要求不高的工作,从而减少低学历人才难以就业、高学历人才奇缺的现象;三是通过综合合作与跨区域立法的方式,改变政府部门较多且部门之间协作比较困难的现状,将国外区域发展中“以法治为保障”的理念贯彻到长三角发展之中。

在大多数研究中,产业布局(产业转型)和人才开发属于两个领域。但是,本书认为,两者紧密相连: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长三角产业转型,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管理,特别是人才战略与规划的管理,又必须以一定范围内产业的发展导向为出发点。建立长三角人才开发与产业转型综合合作体系,构造跨区域立法模式,能够在区域层面解决许多问题。

建立长三角人才开发与产业转型综合合作体系,构造跨区域立法模式,能够在区域层面解决许多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一) 城市群研究——“上海城市群”的提出

区域的研究源于欧美。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

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假设孤立国是天然的、均一的大平原,这个大平原上只有单个的市场、单个的城市、单个的产品供应点,则单位产品利润 $V = P - (C + T)$,其中 P 表示产品价格, C 表示成本, T 表示运费。在此基础上,可得出结论:生产品种与经营方式选择的首要决定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构成六个环形区。冯·杜能由此成为区域理论的奠基人。^① 1910年前后,美国学者库恩(S. A. Queen)等人又分别提出“都市地区”、“组合城市”、“城市群”等概念。^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学者开始探讨城市体系的变化,主要著作有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斯(N. Gras)的《经济史导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产业和技术革命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体系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贝里(B. Berry)的城市体系与中心地相结合理论、弗里德曼(J. Friedmann)的城市市场理论,即认为城市市场(urban field)是一个空间广阔的、具有多个城镇节点(multinodal)的区域,它包括城市居民巨大的生活空间或活动范围。这个范围远远超出城市建成区,还包括休息区和距城市核心一百多英里范围内的城市远郊居住地。钱纳里(H. Chenery)等人认为,城市化建设只能在平原地区,因为资本、劳动力和农林矿产资源可以流动,唯有土地不可以流动,庞大的城市群不可能建立在山地和丘陵,而只能建立在平原。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较为完善地归纳了“城市群”的特征:以2500万的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口密度为下限的庞大空间;以国际化大城市为核心,沿海轴线发展形成的枢纽;职能分工合理的多中心城市网络;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及其他基础设施。1976年,在题为《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的论文中,戈特曼又提出世界上存在六大城市群的观点。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赫然与纽约、多伦多和芝加哥、东京、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曼彻斯特城市群并列,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城市群”是由国外学者率先提出并作

① 转引自〔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邱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② See S. A. Queen, Community and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了较高的定位的。沙北岭(Shaun Gerard Breslin)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非逻辑》中指出,发展长三角等地区标志着中国从“省域经济”走向“区域经济”。^①

(二) 产业布局:成本、市场、产业集聚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从静态上看,产业布局是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从动态上看,产业布局表现为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空间地域上的配置、转移或重新组合的过程。^②

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发现,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是各国产业布局的不同。他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指出,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长三角应当尽快实现产业转型。

综合多方观点,产业布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中,先天条件和核心要素为区位因素,后天可以弥补的是区域政策。产业布局的评判标准有三个: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形成集聚效益。本书将从这三个标准角度综述相关理论。

产业布局的评判标准有三个: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形成集聚效益。

1. 成本最低

德国学者劳恩哈特(W. Launhardt)于1882年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用几何学和微积分的方法,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的最优定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③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一

^① 参见[英]沙北岭:《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非逻辑》,金禾等译,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卷。

^② 参见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编:《2005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③ 参见[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陈岱孙主编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3页。

书,指出一般性区位因素有“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集聚力”三项。运输费用对工业区位的基本定向起重要作用;劳动力费用对工业区位定向产生“第一次变形”;集聚力是由外部条件引起的向一定地点集中的一般性因素,对工业区位定向产生“第二次变形”。他还假设有一个原料地、一个能源地和一个市场,把三点连接起来形成区位三角形,工厂的空间定位应当在这个三角形内。

可见,韦伯已经跳出了厂商定位时简单考虑运输问题的思维,开始结合劳动力、集聚力等方面的要素作综合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企业发展和产业布局应当与人力资源相匹配。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对此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随着某个行业的发展,材料供应商在企业附近建厂以为不断扩展的行业服务——运输成本降低了,而且产品由不断扩大的企业生产,这样供应变得更加便宜。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行业的特殊需要,还有可能出现运输服务的提供者,又降低了将产品运送到顾客手中的运输成本。此外,一个行业产量的增长通常会扩大该行业中典型企业的规模,随着产量的扩张,以劳动力衡量的生产成本很可能进一步下降。当然,规模报酬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出现递减。^①

2. 市场份额最大与成本最低

与韦伯等人略有不同的是,廖什(A. Losch)从最大利润原则出发,分析企业选址问题。他在1939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一书中强调:如果企业建在能够吸引足够数量的消费者的地点,有足够的消费需求,企业就能获得利润;反之,这样的地点就不是企业合理的空间定位。^②

从廖什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们对于厂商的空间选址从企业本身转向了消费者,这是更加深层的思考。把生产成本与市场份额再作综合,又将产生新的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

① 转引自〔美〕斯坦利·L. 布鲁、兰迪·R. 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② 参见罗勇:《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9页。

论”。他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场上的营销生命,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不一样,其间存在一个较大的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从而决定了产业布局的转移:

在新产品阶段,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技术上未加完善,竞争者又比较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国内市场就能满足企业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

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的打破,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替代产品增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成本的下降,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为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抑制国内外竞争者,企业纷纷到产品所销售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厂(大多为一般发达国家)。

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以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对生产者技能的要求不高,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再将产品远销至别国和第三国市场。

由此可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反映了产业布局的动态性——从最发达国家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过程。与此相对应,从一般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看,就出现了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雁形模式:进口—国内生产—出口。

3. 产业集聚

对于影响产业布局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产业集聚,学界通常认为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企业之间的协作性和竞争性很强,众多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依据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在地理空间上进行聚集,以扩大总体生产能力,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并充分利用基础设施,降低运输费用、生产成本,获得规模效益。当然,产业集聚也有不利影响,例如会导致企业间争地、争水、争劳动力、争公共设施,加剧地区的环境污染等。凯勒(Keller)等人认为,技

术转移与扩散是决定区域收敛与发散的重要因素。^①

产业集聚现象既出现在传统产业中,如意大利北部的制鞋业、法国南部的香槟省、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美国的钢铁带;也大量出现在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如美国的硅谷、好莱坞、波士顿 128 公路,英国的剑桥工业园,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工业园等。

对于产业集聚,韦伯的古典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有一定的研究(在前文的“成本最低”部分已经涉及)。下面主要阐述 20 世纪中后期新经济地理学、网络理论等学派的研究成果。

(1)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在总结哈里斯(Harris)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Dixit)与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垄断竞争假设,以及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理论”(即任何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

(2) 网络理论的一些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商业群体”和“嵌入性”的概念。前者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础上形成的企业联合;后者是

^① See Wolfgang Keller,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Issue 1, 2001, pp. 120—142.

指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是自立的,而是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

网络理论表明:社会关系渗透到各个企业,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常常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取代,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并不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网络,虽然这不是保证信任的充分条件。^①

与网络理论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资本”,指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资源的控制,形成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

网络理论为产业集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助于人们重视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这对分析台商、浙商、闽商等商帮的结群而聚有一定的启发。

网络理论为产业集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助于人们重视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指出:一个优势产业不能单独存在,它一定与国内相关强势产业一同崛起。本国供应商是产业创新和升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最好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德国印刷机雄霸全球,离不开德国造纸业、油墨业、制版业、机械制造业的强势地位。美国、德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优势也离不开其国内钢铁、机械、化工、零部件等行业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则往往采取优先发展某一产业的政策,孤军深入的结果往往是牺牲了其他行业,钟爱的产业也无法一枝独秀。

(三) 人才开发:人才价值、人才培养、人才流动

罗斯维尔(Rothwell)认为,所谓人力资源开发,就是“由组织开展的任何有计划的培训、教育和开发活动……它把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与满足组织中个人的需求和职业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提高了个人对工作的满足度”。舒尔茨(Schultz)认为,人才开发有四个要素: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人力资源流动。由上述观点可见,人才开发包

^① 转引自鲁开垠:《增长的新空间——产业集群核心能力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括人才界定、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等内容,本书根据研究需要,综述其主要部分。

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的第一章“论劳动分工”中,确立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并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同时,他强调政府要对普通大众实行免费公共教育,以防止劳动分工使人变得愚蠢——“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完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者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政府如不设法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员,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①这对人才开发的启示在于:要重视劳动,重视劳动分工,重视对人才的全面培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Soloman Fabricant)等人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的原因,一是规模经济效应导致的报酬递增,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中后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的能力分析的新思路。据舒尔茨估计,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增长率)的30%—50%。他所说的“国民资源”,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仅为1/8。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发现“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就业增长、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由生产中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

^① 转引自〔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展部门的人力开发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正规教育开发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内生效应。该理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人力资本、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比如,意大利人力资源的分布和变动解释了意大利北部的发达和南部的落后,以及南部城市与其他地区在生产结构和功能控制上的不同。在意大利北部,米兰在技术、科学、管理、企业等方面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从而使之成为意大利完整的工业中心;而其他城市,像佛罗伦萨、威尼斯,只在具体的部门存有优势。^①

对于人才流动,美国经济学家马奇(March)和西蒙(Simon)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了就业机会与员工流动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员工离职的最准确的预测指标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当工作充裕时,员工自愿离职的比例就高;反之,自愿离职的比例就低。费希伯恩(Fishbein)提出:对员工离职的行为心理过程的研究中,最重要的、通用的方法是因果行为理论。

舒尔茨的推崇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一书中,除了强调人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外,还指出了在职培训与跳槽之间的关系,认为员工和雇主可能因为在职学习和培训而结为一体。^②

在国内外的人才流动研究中,常用马尔可夫预测法进行预测,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状态的初始概率以及状态间转移概率的研究,确定状态的变化趋势,从而达到预测未来的目的。马尔可夫过程的特点是:每次状态的转移都只与互相连接的前一个状态有关,与过去的状态无关,这种特性称为“无后效性”。^③

此外,还有关于人才进行创造活动的最佳年龄段的研究。美国学者莱

① 转引自潘晨光主编:《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1 页。

② 参见[美]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郭虹等译,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③ 参见赵曙明编著:《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2 页。

曼(Lehman)曾研究了几千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年龄与成就,认为25—40岁是成才的最佳年龄。麦尔斯(Miles)的研究结果也与此基本一致,认为在18—49岁这个年龄阶段,比较和判断的能力几乎处于发展的最高水平。心理学家的研究则表明:人类智力在35岁左右达到高峰,之后即缓慢下降。当然,这是大多数人的普通智力发展倾向。一些科学家、政治家在50岁以后智力水平甚至高于他们的年轻时代。这对本书的启发在于:人才政策不仅要大力吸引那些已经取得成果、年龄在50岁左右的领军型高层次人才,还要大力吸引、培养那些年龄在30岁左右、具有较大潜能的潜力型高层次人才。否则,一则会导致这些青年人才因奔波于生计而荒废潜力的开发,二则易引起人才外流。无论哪种结果,都会造成人才的断层。——目前许多学者已经作出这方面的呼吁。

(四) 人才资源与区域分工:波特的“钻石体系”

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一些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金属冶炼及压延产业比较发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贸易现象越来越多。例如,一些缺少铁矿的地区,钢铁工业却很发达;一些原本缺少资本的国家,资本密集型的造船、汽车等行业却日益壮大;等等。

对此,战略管理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建立了综合性的分析模型——钻石体系。他提出了四个决定因素:一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等。二是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即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四是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波特认为,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个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机会无法控制,政府政策的影响则不可漠视。

生产要素又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和研究机构等。